

中国
图书
年鉴

1996

ZHONGGUOTUSHU
NIANJIAN

中国图书年鉴

ZHONGGUOTUSHU
NIANJIAN

1996

杨牧之 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ISBN 7-216-02651-9



9 787216 026512 >

鄂新登字 01 号

中国图书年鉴(1996)

杨牧之 主编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文字六〇三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64.75

字数：1992 千字

插页：7

版次：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定价：107.50 元

书号：ISBN 7-216-02651-9/G·693

中国图书年鉴编委会

顾问 于友先

主编 杨牧之

副主编 阎晓宏 吴尚之 路用元 刘鼎华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笑然	马豪德	邓本章	韦克	卞恩才	毛集泽	刘玉山
刘代文	白 焯	成云东	邢克斌	孙 颢	朱赛玉	李文兵
李树人	李海洲	吴体刚	吴宣文	陈 莹	陈肖人	张 炜
张 樱	杨寿松	杨德炎	邱久钦	周 思	罗见龙	郑一奇
姜 影	赵昌平	夏代忠	陶有法	郭 平	郭志坤	朗杰平措
袁定坤	殷爱平	黄日星	黄柏青	塔 木	熊国祯	樊希安
戴 贤	戴木金	魏 兴	魏善和			

中国图书年鉴编辑部

主 任 胡光清
副 主 任 刘 苏
成 员 卢净璇 赖洁玉 李 鹏 章 玮

本卷文字
编 辑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皓 卢净璇 刘 苏 李 鹏 赖洁玉

责任分类

李 鹏

编 务

章 玮

电子技术

编 辑

陈 革

责任印制

杜义平 但汉青 肖正华 王铁兵

责任校对

和晓玲

封面设计

梁 巍

编辑说明

一、编辑《中国图书年鉴》是继出版《中国图书大辞典》(1949—1992)之后的又一项图书出版事业的基本建设,其宗旨是总结图书出版工作经验,观察、分析图书出版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为科研、教学、著述、学习和图书出版工作提供系统的参考资料。

二、《中国图书年鉴》与《中国图书大辞典》(1949—1992)的收书截止时间相衔接,对从1993年起国内出版的图书及资料进行收集整理,每年编辑出版一卷。编辑方法按每年新版图书品种总数的10%,选取优秀图书和有代表性的图书,以条目形式作介评,并按学科分类编排。

三、《中国图书年鉴》1996年卷,主要反映上一年度全国图书出版工作的情况和资料。其主要内容有“专论”、“图书出版评述”、“新书简介”、“获奖书目”、“统计资料”、“图书出版纪事”、“索引”等。

“专论”——选载对全国图书出版有指导性意义的重要论文。

“图书出版评述”——特邀国内有关专家、学者及图书编辑,对各类图书的出版动向作评论分析;选录各报刊杂志发表的有关图书出版评述的文章。

“新书简介”——从1995年新版图书总数中,择优选取5800余种图书立目并作介评,按《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三版)体系分类编排。辞条以介为主,寓评于介,着重反映所诠释图书的基本内容及主要特征。

“获奖书目”——主要刊载该年度荣获“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辞书奖”的书目。

“统计资料”——汇编该年度全国图书出版情况,使用《中国标准书号》22类图书出版情况,各类课本以及少年儿童读物出版情况。

“图书出版纪事”——记录该年度有关图书出版的重大活动。

“索引”——为方便查阅新版图书,索引分“辞目分类索引”和“辞目笔画索引”两部分。“辞目分类索引”以《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三版)》为框架,其编排方式与新书简介的正文相同;“辞目笔画索引”按书名辞目首字笔画数顺序编排。各辞目前均标有六位数码,为该辞目的检索号,检索号前英文字母为该分类代码。检索号按数序顺列,以便查找。本书索引均直接指向条目检索号,页码不参与检索。

四、编辑出版《中国图书年鉴》是一项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播工程。此项工作得到了全国出版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与热情关心,在此谨致以诚挚谢意。由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所限,《年鉴》难免存有不足和缺憾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各界人士批评指正。我们将不断改进工作,提高质量,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目 次

专论	1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保证良好的出版质量	1
西北部地区出版发展的状况及建议	4
图书出版评述	9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类图书出版综述	9
哲学类图书评述	10
社会科学总论类图书评述	12
政治、法律类图书综述	14
军事类图书综述	17
经济类图书综述	19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图书出版简评	21
语言文字类图书述评	22
文学类图书出版评述	24
艺术类图书出版简评	26
天文学、地球科学类图书综述	27
自然科学总论类图书综述	29
综合类图书评述	30
悲壮历史的再现	32
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科技类图书述评	35
第一、二届国家图书奖艺术类参评图书综述	36
“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评奖经济类参评书综论	37
“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评奖文艺类图书综述	38
“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少儿类参评图书综述	39
市场经济类图书出版热一探	40
1990年以来我国出版的商务工具书综述	41
1995年文学图书趋向透视	43
关于近年散文类图书的一个观察	45
给孩子一片优质的“面包”	46
计算机图书出版十年	48
新书简介	51
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51
B 哲学	62
C 社会科学总论	84

D 政治、法律	97
E 军事	150
F 经济	157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231
H 语言、文字	293
I 文学	324
J 艺术	469
K 历史、地理	514
N 自然科学总论	608
O 数理科学和化学	617
P 天文学、地球科学	629
Q 生物科学	647
R 医药、卫生	657
S 农业科学	707
T 工业技术	731
U 交通运输	832
V 航空、航天	842
X 环境科学、劳动保护科学	845
Z 综合性图书	852
获奖书目	860
第二届国家图书奖获奖图书	860
1994 年度“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获奖图书	864
第九届中国图书奖获奖图书	865
首届中国辞书奖获奖书目	868
统计资料	870
1995 年图书出版情况	870
1995 年使用《中国标准书号》22 类图书出版情况	870
1995 年各类课本及少年儿童读物出版情况	872
图书出版纪事	873
索引	881
辞目分类索引	881
辞目笔画索引	957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保证良好的出版质量

——第二届全国图书奖评奖综述

国家图书奖评奖办公室

一

1992年10月,经国务院同意,新闻出版署作出决定,自1993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国家图书奖的评选活动。1995年适逢第二届全国图书奖评选。这届评选将要从1993年、1994年两年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12万种新书中选拔出最优秀的图书。1995年初,党中央批转了新闻出版署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第二届全国图书奖的评选,对于贯彻中央对出版工作的指示,推动图书出版由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的转移,促进图书质量的提高;繁荣图书出版事业具有重要意义;这届评奖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推动出版工作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以激励出版工作者从根本上把握出版的政治方向,努力提高文化品位,努力提高图书质量。

第二届评奖要求各出版社选送参评图书不得超过两种,但已获新闻出版署主办的各门类图书专项评奖一等奖的图书,可以不占出版社的品种数。通知发出后,各出版社及其主管部门对国家图书奖的评选予以极大重视,特别是一些省新闻出版局几次专门开会研究参评图书,力争把最优秀、最具特色、最能代表本地区、本社出版水平的图书推荐给评委会。全国有341家出版社报送了654种参评图书。

根据图书的特点,国家图书奖分为九个门类,即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古籍整理、少儿、教育、辞书工具书、少数民族图书。相应的评奖委员会

也分为九个分评委会。第二届全国图书奖评奖委员会是在第一届评委会的基础上,在人员上作了相应的调整,其成员包括我国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著名专家学者王朝闻、季羨林、卢良恕、任继愈、陈原、叶至美、邢贲思、顾明远等,并聘请吴阶平、胡绳、徐惟诚、宋木文、周振甫为评委会顾问。

1995年10月14日召开了评委会第一次会议。评委会主任、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在会上指出,设立国家图书奖的根本目的是要评出好书,评出导向,促进图书出版事业的繁荣,并且强调这届评奖在重视图书内容质量的同时,也要注重编校质量和印装质量,即使图书内容较好,但编校质量不好,也不能获奖。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代表中宣部在会上对评奖工作提出了要求和希望,并且指出,将优秀图书评选出来,对广大的出版工作者和专家学者都是很大的鼓励,也有利于在出版工作中进一步树立精品意识。他对评奖概括为6个字:评优、导向、鼓劲。

评奖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全国各出版社经过筛选共呈报参评图书654种,评奖办公室整理分类,把参评图书分别归入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少儿、教育、古籍整理、辞书工具书、少数民族文字图书9个类别。

第二阶段,初评。1995年10月中旬评委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评委会主任、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同志、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同志对本届评奖工作提出了要求和希望;随后,由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60位同志组成的评委会分九个分评委会,对参评图书进行了认真审读评选,确定152种图书作为初评入选图书。

第三阶段,进一步审读、检查初评入选图书质量。11月中旬,152种初评入选书目在《光明日报》、

《新闻出版报》、《中华读书报》上公布,听取全国读者的意见;与此同时,评奖办公室组织人员对初评入选图书进行了图书编校质量检查和印装质量检查,结果有12种图书虽然初评入选,但由于编校质量不合格,失去了参加复评的资格。

第四阶段,复评。12月中旬,九个分评委会根据读者意见,编校质量和印装质量检查结果,对初评入选书目再次进行审阅、比较和分析;并根据评委会主任会议确定的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荣誉奖的奖额比例,确定分评委会的候选书目,然后正式向全体评委会会议汇报每种候选图书的情况。最后,全体评委进行无记名投票,评选出92种获奖图书。其中,《学术论著自选集》等7种图书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中国通史》等29种图书获国家图书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等56种图书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二

第二届国家图书奖评选出的92种获奖图书,是1993年、1994年出版的优秀图书的代表。这些图书在内容、编校、印装等方面都是上乘之作,也反映了正确的政治导向。

1. 宣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本指针,是思想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对于出版工作来说,就是要组织好这方面图书的出版工作。近几年陆续出版了不少研究邓小平思想的图书。其中,国防大学出版社的《邓小平思想研究》一书,以其论述的系统性与深刻性在同类书中得到专家学者的更高评价。它不只是将研究资料汇编,而是由国防大学组织军内外17个单位、20多位专家学者,深入研究邓小平思想,结合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实际,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经过6年的时间撰写完成的。全书三卷,300多万字。读者反映这是一部有深度的科研著作,为深入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学习资料。

2. 努力体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本届评选参评的科技图书约150种,内容涵盖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科普等领域的主要方面。参评图书质量普遍较高,入选的18种获奖图书突出了理论上的权威性、学术上的先进性、技术上的应用性、文化上的积累性以及普及上的通俗性等几个特点。如:《中国矿床》,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中国矿床概貌、成矿理论和成矿规律的专著,是我国几代矿床地质工作者几十年进行矿产勘查和研究的结

晶。吴阶平教授主持编写的《泌尿外科》,反映了包括腔内泌尿外科、体外碎石、经皮肾动脉扩张以及肾移植等前沿理论和技术在内的学科新进展。《昆虫病理学》系统总结了国内外近30年来有关昆虫病理的学术发展和成就,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映。

3. 大力宣传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国民教育的永恒的主题。图书作为一种宣传媒体,在这方面应做出突出的贡献。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出版社在此之前出版了大量反映这一主题的书籍。获奖图书中有解放军出版社的《抗日战争史》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抗日战争史丛书”,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活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战争和人》是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文学作品,这些图书以确凿的历史事实和生动的语言,向人们再现了50年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悲壮历史,使每一个活着的人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从而使人们永远保持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信念以及光荣传统。使人们更加珍惜和热爱生活,努力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洪流之中。

4.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财富。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有许多文化珍品淹没在浩瀚的典籍之中,有些散失在国外,使这笔宝贵的财富在今天发扬光大,是出版者的光荣职责。为此,出版社不惜花巨资将优秀的传统文化整理出版。在获奖图书中,四川人民出版社《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一书是杰出的代表。敦煌文献是我国古文献中具有珍贵价值的国宝。由于历史的原因,敦煌文献大批流失在国外,“敦煌学”已成为国际“显学”之一。为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我国的敦煌学家1987年和英方达成协议,用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原件,集中社会文书部分拍摄制片,四川人民出版社取得版权,并全力以赴,高质量编校、出版了这部书。该书的印装质量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这部书不仅生动地再现了中华优秀文化的多姿多采,促进了“敦煌学”的发展,而且显示了中国出版界的实力。

5. 为农村基层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出版工作的根本宗旨,评出导向是评奖工作的重要方针。第二届评奖工作一开始,有关领导同志就指出,获奖图书不能只是那些大部头、一般读者、特别是广大农民看不到、买不起的书。评

委们在进行初评、复评工作时充分考虑了这个意见。认为有些书即使装帧不是那么豪华,但确实是为农村服务的,在内容质量上是好的,也要给予奖励。由四川 21 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农村文库》,内容包括:政治·思想·国情·政策·法律·经济管理·经济往来·文化教育·医药卫生·文学·艺术·科学知识·实用技术·生活常识·文体体育等七大类;全书共 100 册,是专门为广大农村读者编写出版的大型综合性图书,具有简明、通俗、实用、价廉的特点,农村读者看得懂、用得上、买得起。可以说该书是当今中国最廉价、最实用的农村百科全书。

三

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的获奖图书各具特色,但就获奖图书的结构和特点,可以看出评奖工作注重的一些方面。

1. 注重图书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

作为图书评奖的最高奖,评选工作在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的前提下,非常注重图书内容的学术价值。获荣誉奖的《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收有冯友兰等 21 位在中国当代文化学术界享有盛誉的一流学者一生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内容涉及的学科十分广泛,可称为当代的“诸子百家”。宗白华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曾出版作品仅 40 万字。而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宗白华全集》是经过对宗白华遗下的文稿、讲稿、笔记整理而成的,全书 200 万字,许多作品是首次面世。该书的出版为我国美学思想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中国三峡》公认为是艺术价值极高的摄影画册。三峡水利工程举世瞩目,十几年后“高峡出平湖”。为使后人了解三峡的雄姿,该书编委会荟集了众多摄影家,他们从重庆沿江而下至宜宾,将各市县的自然风貌,人文景观运用艺术摄影的手法,凝固了三峡地区在水利枢纽工程动工前的一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资料。该书出版后,在海外被誉为中国出版界、摄影界的“三峡工程”。

2. 注重理论政策研究为现实工作服务

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一书是专门讨论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化改革的专著,该书紧密结合我国企业改革实践,提出一整套企业改革具体设想,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求索丛书”在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比照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从现代教育科学理论的高度,对近年来中小学教育改革经验进行了概

括和总结,提出了我国教学和课程设置的新构想。

3. 要有较好的编校质量

第二次评奖初评结束后,对入选图书进行了编校质量检查,其中有 12 种图书属不合格品,不能参加复评;当然,也就失去了获奖的机会。这其中有些书是非常可惜的。如《简明中华百科全书》在辞书类的排名比较靠前;文学分评委会对《杨绛译文集》的评价也较高。图书是一种产品,也是知识文化的载体,如果它的编校质量差,对读者有直接的坏影响。要改变“无错不成书”的状况,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但作为精品书、获大奖的图书,不仅要内容好、外观美,在编校质量方面也要过得硬;三者必须兼顾。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图书的包装越来越精美,但要做到内容好,就比较困难了,要达到编校质量优质,则更困难。国家图书奖在这方面必须有明确的要求。这次评奖对编校质量的要求是必须达到合格(即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内),以后的评奖对编校质量的要求要逐步提高,争取早日达到获奖图书必须是优秀品(即差错率在万分之零点二以内)。

4. 要充分体现党的民族政策

把少数民族文字图书作为一个获奖门类是国家图书奖的一个特色,它充分体现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政治生活中是平等的。在评奖工作中,评委会考虑到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类图书的特点,尊重民族分评委会的意见,在奖额的分配上给予足够的关照。尽管少数民族图书送评的数量较少,但还是有 7 种图书入选,其中 2 种书获国家奖,4 种书获提名奖,获奖比率在各门类中是最高的。

图书评奖是一次检阅,它从选拔、推荐到评选,较全面地检阅了 1993、1994 年我国图书出版的状况,其中经验、成果有之,差距不足有之,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地深入总结思考,改善出版工作。图书评奖是一个鲜明的导向,获奖图书较好地代表和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出版工作的期望与要求,这些图书数量虽然有限,但是却树起了一面旗帜,为繁荣出版事业切实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图书评奖是一次鼓舞士气的动员会,有了榜样,有了目标,广大出版工作者为之向往,由此形成出版好书光荣的环境与氛围,这一点对评奖工作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由于评奖数额的限制,有些书未能入选,这对于评选者和参评者而言,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96 年第 4 期)

西北部地区出版发展的状况及建议

杨牧之 阎晓宏

由于历史、环境等各方面的原因,西北部地区的出版整体水平远远落后于中部、东部,尤以宁夏、青海、新疆三地为甚。根据友先署长指示,为了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逐步扭转西北部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图书司杨牧之、阎晓宏、叶树人、于青、白兰香一行五人,于1994年12月分两个阶段对西北五省区的出版情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研,初步摸清了西北部地区出版的现状、成绩与问题;并由五省区出版负责人参加,根据分省区调研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进行综合性的分析、比较与研究,提出了西北部地区出版发展的设想与建设。

西北部地区出版的基本概况

1. 出版社情况

目前,西北五省区共有出版社39家。其中,宁夏3家,青海2家,甘肃8家,新疆10家,陕西16家。这39家出版社中,有11家成立于1979年之前,它们是:五省区的人民出版社,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新疆教育出版社,伊犁人民出版社及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其他28家出版社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立的。

2. 出版社队伍情况

西北五省区39家出版社目前共有人员2306人,平均每社59.2人。其中专业人员(编审、副编审、编辑、助编等)共有1536人,平均每社39.4人。西北五省区出版社中的专业人员占队伍总人数的66%。

3. 出书情况

1979年西北五省区11家出版社,年共出书1252种。1993年西北五省区39家,年共出书7055种(其中新书5180种)。其中:宁夏401种,新疆1896种(其中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蒙文、锡伯文图书1402种),甘肃1244种,青海726种(其中藏文图书268种),陕西2788种。

4. 图书发行情况

1993年,西北五省区发行图书码洋为8.677亿元,其中:新疆2.5亿元,宁夏0.65亿元,青海0.2905亿元,甘肃1.7亿元,陕西3.537亿元。

5. 图书经营情况

1993年,西北五省区出版系统上交国家税收6486万元,其中:陕西4000万元,甘肃1700万元,宁夏400万元,新疆200万元,青海186万元。新疆、青海二地出版整体是亏损的,需接受国家财政补贴,所上交的只是增值税和流转税。

1993年,新疆接受财政补贴1628万元,青海接受财政补贴170万元,宁夏接受财政补贴35万元。共计:1833万元。

西北部地区出版工作的

地位、特色及新取得的成就

西北部地区幅员辽阔,总面积达296.6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30.9%,生息着21个民族,计8045万人口。由于历史的、环境的等多方面的原因,西北部的发展滞后于全国。在这样的环境中,西北部地区的出版工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一定的制约和影响。但是,西北部地区的出版工作毕竟没有停留在制约和影响之中,在改革开放的路线指引下,在西北五省区各族出版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出版工作取得了成绩。

1. 事业发展情况

从自身发展的纵向看,1979年,五省区共有出版社11家,现在已发展到39家,增长了三倍多;1979年,五省区以维、藏、蒙、汉4种文字出书,年出书总量为1252种;到1993年底,年出书品种达到7055种,增长了36倍;出书的文种达到维、藏、蒙、哈、柯、锡伯、汉7种,增长了近一倍。从横向看,也取得了与全国出版事业同步发展的可喜成就。从1993年的统计数字看,西北地区出版社数量占全国出版社总数的7.1%,年出书量占全国出书量的7.2%。从出版队伍的情况看,全国548家共有人员40000余人(据出版社自报数统计),其中专业人员22000人,专业人员所占比例为55%。西北部地区出版社人员总数为2306人,略低于全国出版社人员的平均水平;但其中的专业人员却有1536人,占出版社人员总数的66%,专业人员比例数比全国出版社专业人员比例数高11%。

2. 分省的出书情况

宁夏是一个回族聚居地区,该地区自建国以来,共出版 6500 多种图书,总印数达 36000 万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出书的数量与质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提高。自 1979 年以来,共有 233 种图书获得国内的多项图书奖,其中,16 种图书获得全国性图书奖,117 种图书获得国内多种专项图书奖。

甘肃省的出版事业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1979 年,甘肃只有甘肃人民出版社一家,年出书品种 257 种。到 1993 年,已发展为 8 家出版社(其中甘肃人民出版社下设 6 个专业出版社),年出书 1244 种。现在甘肃省大约每年有 50 多种图书获得国内各种图书奖。

青海省只有青海人民出版社一家(青海民族出版社只作为其副牌使用)。建国以来至 1993 年底,青海人民出版社(含青海民族出版社)累计出书 6430 种,其中汉文图书 5142 种,藏文图书 1288 种,总印数达 6083 万册。在多年的出书中,青海人民出版社严格按照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安排出书,多种图书荣获中国民族图书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议与管理》荣获中宣部 1994 年度“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国以来累计出版图书总数达 28077 种,其中维吾尔文、柯尔克孜文、哈萨克文、蒙文、锡伯文 5 种文字图书品种达 21450 种,占全部出书品种的 75%。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出版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1979 年新疆共有出版社 5 家,出书总数为 679 种;到 1993 年末,出版社已发展到 10 家,出书总数为 1896 种。出版社增长了一倍,出书品种增长了近 3 倍。1979 年以来,全区各出版社获奖图书共达 405 种,其中全国性评奖 112 种,地区性评奖 293 种。17 种图书荣获各届中国民族图书奖。

陕西省出版事业发展最为迅速,成绩也最为突出。该省在 1979 年前,仅有两家出版社,出书量平均每年仅为 171 种。1993 年该省已有 16 家出版社,年出书量达 2788 种(其中新书 2279 种,重印书 509 种),出版社增长了 8 倍,出书增长了 16 倍。总印数也由 1979 年的 9121 万册,增长为 1993 年的 16819 万册,增长了近一倍。该省获省级以上奖励的优秀图书品种已占出书总数的 10%。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荣获 1993 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一本好书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九章算术〉及刘徽注研究》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近年来,该省对外出版工作活跃,呈日趋

上升之势,每年有近百个品种的图书通过版权贸易引进或输出。从出书门类来看,涉及学科门类广泛,品种齐全,政治、经济、哲学、法律、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理工、医药、农林、科技、古籍、方志、旅游、少儿、文教已成为主要出版门类,并能出版英、日、德、俄、法等语种图书。

3. 出书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西北部地区出版工作在实践中已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在一些领域打出了自己的牌子,在全国占居了领先地位。比如:宁夏的西夏学研究,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宁夏人民出版社就下功夫做好出版工作,出版了一批这方面的研究著作,许多远销到日本和俄罗斯。由于研究和出版工作的密切配合,现在国际西夏学研究的中心,已由过去的日本和俄罗斯,转移到中国宁夏。青海的藏文化研究与出版、青海高原研究与出版,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已初步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与风格。所出版的《格萨尔王传》(系列书)、《嘛呢全集》、《青藏高原发展研究》、《才旦夏茸文集》、《藏传佛教文化丛书》等一大批图书,在藏、川、甘等地享有盛誉。陕西省为历朝古都,历史文化研究条件得天独厚,又是老革命根据地,在革命传统教育方面亦有优势。该省在科研方面实力雄厚,共有高等院校 52 所,科研单位 50 余所。陕西省出版工作,比较充分地利用了本地的优势,在出书方面,重点挖掘三大系列的选题,一是关于历史文化考古方面;二是科技图书;三是革命传统教育方面的图书。这三大系列的图书已成为陕版图书的特色与优势。新疆在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原则的同时,还强调坚持以少数民族文字为主的出版方针,以 6 种文字出版的各类图书中,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占全部出书的 75%,其比例之高,在全国首屈一指。这是新疆出版工作的一大特色。

西北部地区出版工作

存在的困难、差距与问题

1. 人口少,市场小

西北五省区土地面积占全国 30.9%,而人口只有 8045 万人,仅占全国的 6%。在当前图书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形成之前,人口是制约地方出版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方面,西北部地区出版工作,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以教材和教辅出版为例,其他省份,由于人口大大超出西北各省区的人口数,仅教材、教辅的出版一项,就能比较稳定地盈利上千万或几千万;而西北部地区,由于人口少,除陕西省教材、

教辅出版盈利较大外,其他四省区,甘肃仅盈利 200 多万,宁夏盈利 170 万;新疆虽有 1600 万人口,但要出版 6 种文字图书,因此,教材、教辅出版也是亏损的;青海仅有 460 万人口,出版藏汉两种文字图书,所出版的教材、教辅也是赔钱。就一般图书而言,有些图书在内地大省可以印发三、五万册,但在青、宁、新,可能印发不了几千册。

2. 地处偏僻,发行不便

西北地区人口只占全国的 6%,但是面积却占全国的 1/3。这样辽阔的面积,再加上交通不便,就成为制约西北地区出版事业发展的又一个不利条件。在出版工作进入市场经济轨道之后,这一劣势就更加明显。由于发行量小,更增加了发行图书的费用。新华书店总店曾有对边远地区让 5 个折扣的优惠,但很难兑现。有些内地畅销的图书,西北部地区进货进不来,原因是需求量小,发行费用高,内地一些出版发行单位不愿意为其发货。

3. 出版图书效益差,财政补贴逐年减少

西北地区出版社的规模和出书的情况与全国保持了同步发展。但是,在出版的经济效益方面和全国存在着很大差距。西北五省区出版系统(39 家出版社)的年利润,如扣除国家财政补贴数额之外,总计为 4653 万元,只相当于内地效益好的 2—3 家出版社年盈利数额。最为突出的是青海、宁夏、新疆三省区。青海省出书效益总体算下来是只亏不盈,每年需要由国家财政补贴 160 万元。宁夏出书年盈利 190 万元,但其中 170 多万元是教材的盈利,所出版的 200 多种本版书,只盈利十几万元,每种图书盈利不到 1000 元。新疆各家出版社长期处于严重亏损局面,每年财政要给各出版社投入 1600 多万元。由于出书没有经济效益,出的多就亏损的多,有些出版社就采取少发稿、少出书的消极办法,以降低亏损。据了解,柯尔克孜文出版社由于经济拮据,已有近一年未发稿了。新疆人民出版社最近把办公大楼租出去当招待所,年收租金 120 万元;编审在家看稿子,其他编辑一部分在招待所当招待,其他人无处上班只有呆在家里。财政对出版的补贴在逐年减少。青海现在每年维持 160 万元的财政补贴,已属不易,由于物价上涨因素,几年前就补贴 160 万元,现在虽维持不变,实际补贴等于有所减少;新疆自 1987 年开始每年补贴出版 1628 万元,这几年一直未有增加;宁夏原来年补贴出版 50 万元,现在财政决定每年减少 5 万元,1994 年已减到 35 万元。

4. 设计选题与组稿能力差

虽然西北部地区出版社专业人员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 66%。但由于地处偏远,西北地区编辑和内地交流少,对全国的图书市场情况了解不够。青海、宁夏、新疆的有些编辑,从未到外地出差组过稿。久而久之,即使把编辑们派出去,由于缺乏和作者之间的联系与了解,也得不到一流的稿件。在调研过程中,许多编辑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西北地区难以得到一流的稿件和作者,所拿到的稿子总是别人挑剩下的。有一些编辑自己从未组过稿件,所编辑加工的稿件是社里、编辑室里确定下来,再分配给编辑的。由于对图书市场的情况了解不够,所设计的选题、组的稿效益差,基本都是赔钱书。

5. 对出版改革存在两种偏颇认识

一种是依赖思想。有的同志认为西北地区出版落后是客观因素所决定的,难以改变,只有依靠国家的政策优惠与经济扶持才能够维持和发展。有的人说:“西北部地区出版工作落后全国 100 年不改变。”

一种是对待出版改革有急功近利的思想。许多编辑谈到西北部地区出版工作时感情激动,改变出版落后面貌的心切。但是由于这些年在改革方面和内地存在一定差距,有些出版社仍是吃大锅饭,没有激励机制,有些出版社刚刚开始试行岗位目标责任制。在这种情况下,对待出版改革,有急功近利思想,或者把出版改革只作为在经济上翻身的一种手段,有的甚至走到卖书号的路上。1993 年,新疆大学出版社卖书号 70 种,得款 18 万元就是最为突出的例子(该社已被停业整顿,社长撤职)。

6. 管理体制比较乱,有的省出版管理体制缺乏活力

西北五省区有 4 种出版管理模式。陕西和新疆实行的是局社分开的体制,不同的是陕西省出版没有财政补贴,新疆出版有财政补贴。因此,在管理上陕西各出版社均实行自负盈亏的管理办法,对内普遍实行了目标责任双效管理办法;而新疆出版社多数为补贴出版、差额预算方式,出版社内部也采取了一定的以减亏定额为目标的责任制度。青海省实行局社合一的体制,局长即是出版社社长;经济上实行亏损补贴方法,出版社内部管理近期拟试行以减亏为盈为目标的管理办法。宁夏局社是一个党组,局长是党组成员,出版社社长是党组书记;出版社自负盈亏,局和宁夏画报(隶属出版社)由财政每年补贴 35 万元,与出版社盈利及补贴的 35 万元合在一起,共同使用;局社共有一个财务,出版社内部管理实行目标责任制。甘肃新闻出版局和出版总社是一套人马,

但总社实际上是空的。总社不管甘肃人民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又下设6个专业出版社,在人事关系及财务等各方面,甘肃局(总社)和甘肃人民出版社都是分开的。青海省出版是接受财政补贴部门,一般应实行差额预算管理,给定补贴额后出版社节余归己,创收归己,这样才能调动出版社的积极性。但是,财政部门不同意这样做,如有节余或创收,则要核减财政给出版年补贴160万元这个总数。

西北部地区出版

发展的设想及几点建议

根据西北部地区出版工作的现状和问题,拟提出以下设想与建议:

1. 西北部地区出版工作把缩小与内地出版工作的差距作为近期战略目标。根据西北部地区出版工作落后于全国的现实,应把缩小与全国出版工作的差距作为阶段性目标。按照这样的地区发展战略思路,根据各省区的出版实际,制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及实施措施。

2. 国家应对西北部地区出版工作实行倾斜式优惠政策,尽可能地帮助和扶持它的发展。

3. 地方财政是维持一定的补贴水平并力争逐年有所增加,而不是定额包干逐年递减。

4. 西北部地区出版工作应重点扶持的是青海、新疆、宁夏三省区。西北五省区之间,出版工作发展也不平衡。根据五省区的出书情况及存在的困难程度,情况最好的是陕西,年出书近3000种,全省16家出版社没有一家亏损,只是盈利多少而已,全系统年利润4000万元,占西北地区出版利润的2/3。该省出版水平接近或达到了内地水平,以后是进一步提高的问题。其次是甘肃省,8家出版社,年出书1200多种,全系统盈利近2000万元。最为困难的是青海、新疆、宁夏三省区,其中又以青海、新疆为最,目前出版处于亏损经营状态。

5. 培训队伍。这是改变西北出版落后面貌的重要环节。西北地区编辑队伍素质是制约西北地区出版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该地区的许多编辑只能做文字工作,图书市场调查、设计选题与组稿能力,因此,所出版图书缺乏市场竞争能力都需加强。最为突出的是青海和新疆,编辑一般不组稿,不了解市场,年出版近200种本版图书,还要赔进去几十万元。有的是不了解国家关于出版的方针、政策,急功近利,试图通过与二渠道合作(实际是买卖书号)创收。这虽然有其他一些客观方面的原因,但是与队伍素质亦有直接的关系。

6. 深化出版改革,更新观念,进一步理顺出版体制与出版管理体制,建立并逐步完善以实现“双效”为目标并具有激励的岗位责任制度。

①出版管理体制,按照国务院“三定”方案,提请地方政府及党委宣传部门考虑,进一步理顺。

②出版体制与模式。主要是分社问题,此问题陕西、新疆、甘肃基本解决。宁夏、青海二地分社呼声比较高。对此,我们作了一些考察与了解,感到分社这一措施在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对地方出版事业有很大促进,但现在全国许多地方已开始由分社而向联合的道路上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宁夏、青海有无必要再走分社的道路呢?这值得认真研究。由于宁夏、青海二地出版基础比较薄弱,如再分成几个独立小社,势必进一步分散力量,难以集中干一些事情。如果不同意他们分社,青海、宁夏的同志认为这种“大一统”的体制缺乏活力,难以发展和提高竞争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考虑走北京出版社模式,一块牌子,多块副牌,各自经营,统一核算呢?

③强化出版社内部经营管理,建立具有激励机制的、以“双效”为目标的岗位责任制度。对政策性亏损的地方争取实行差额预算的管理办法。给定补贴数,完成规定指标和任务后,节余和创收部分应允许出版社全部留用或部分提留。对内,应建立严格、高效的管理机制,提高经营水平,降低各项管理及生产消耗,寻求各项费用的支出与产品之间的最佳效益。

④更新观念。熟悉了解党和国家对出版工作的一贯要求,以及当前出版工作的重点;熟悉各项出版管理的规定,熟悉当地党和政府对出版工作的要求,根据当地的实际,提出发展战略与策略;掌握国内图书市场的情况,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测或估计图书出版与发行的走向;敢于进入国内国际市场,参与竞争。

7. 设立西北地区出版基金。西北有一些达到国际水平的学术书,特色书,如:宁夏的西夏研究,甘肃的敦煌文化,青海的藏文化与青藏高原文化等等,但是往往印数小,这些地区经济无力承担。比如:1995年在宁夏召开的国际西夏学研究会,有9种关于西夏学术研究的书须出版,但印数很小,最少的一种只能印几十本,全世界能看懂的据说只有20多人。如要安排一些重头书,大型书或国家重点图书,也存在着缺乏资金问题。

国家最近决定出版税收部分返回,这对于那些出版大省,是锦上添花,交国家的多,返回的也多。青海、新疆就没有返回的,宁夏、甘肃也只能返回很少

数量。

建议设立西北地区出版基金,使用重点是:青海、新疆、宁夏、甘肃地区。

8. 考虑到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出版量有滑波的情况,为了体现国家对出版少数民族图书的优惠政策,对少数民族文种图书实行书号不限的特

殊政策。自1995年起,少数民族文字图书不限书号。

9. 条码问题。为千方百计帮助西北地区出版工作,建议免征或减征少数民族地区条码费用。

(原载《中国出版》1995年第5期)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类图书出版综述

俞思念

本年鉴收入 1995 年出版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类图书计 87 种,比 1994 年的数量有所增加,内容也更加丰富。这一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类图书出版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出现新气象

使人高兴的是,盼望已久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1—4 卷)、《列宁选集》第三版(1—4 卷)在 1995 年由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这两部书早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在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群众性理论学习中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也是理论研究者最常用的经典著作。随着时间推移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对旧版作若干修订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为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经过长时间工作,经过精心审校和重新编目,推出了这两套书的新版本。

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第三版《列宁选集》删减和增补了一部分篇目,对译文作了若干修订,并在检索和注释、说明等辅助文字上都作了较大改进。相信这两部使用率最高的经典著作,将更加受到欢迎。

同年推出的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 1 卷、第 11 卷、第 30 卷,这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实现其更新版本计划的前一部分,其他各卷亦将逐次出版发行。这样,自 1985 年开始《列宁全集》第二版已先期完成以后,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已在我国全部出齐。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经典著作出版的一件盛事。这对于推动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具有巨大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在我国的出版一向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新版本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在马列著作翻译、整理、出版上达到较高的水平。

在《邓小平文选》1—3 卷汉语版之后,《邓小平文选》民族文字版亦以多种少数民族文本出版发行,这是图书出版工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民族地区的学习与宣传所作的积极努力。

同时,关于邓小平论述的汇编也成为学习的常用书。这些书的出版有:《邓小平论教育》、《邓小平新时期执政党建设论述》(专题摘编)、《邓小平论祖国统一》等,对于从事相关工作人员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类图书的出版适应了普及与提高的要求

关于马克思主义学习的辅助读物,受到一定重视,本年度先后出版《画说〈资本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导读》、“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丛书”、《列宁著作在中国》等。尝试比较通俗地向群众宣传和解说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一件不可忽视的工作,图书出版应当向这方面努力。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马克思主义史》(第二卷),则是积中国学者长时间研究成果的一项大制作,是值得记述和评介的。虽然这部著作未能在今年出齐,但它已显示了资料翔实、研究深入、内容丰富的特点。与此相媲美的是,继《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列宁思想史》问世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在本年度推出《毛泽东思想史》,成为完整地研究各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与思想结果的力作。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及中抓紧理论建设和提高,我们的图书出版工作不应放弃这条常规性路子。

三、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仍有大的出版潜力

回忆与研究毛泽东的图书在本年度仍表现出极大出版潜力,先后推出了《毛泽东和国际友人》、《说不尽的毛泽东》、《毛泽东对历史的考察》、《毛泽东与中国农业》及一批回忆毛泽东的图书。这表现了中国